

# 文藝散論

劉綏松著

# 文 藝 散 論

劉 綏 松 著

長 江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武漢

## 內容提要

這是作者近年來的論文集，共有十二篇，其中有：對魯迅思想的研究及對其某些作品的分析；對胡適、胡風的反動思想批判和對俞平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它對一般文藝工作者及文藝愛好者，有一定的幫助。

## 文 藝 散 論

劉 綏 松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 332 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3 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汉市國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框  $\frac{1}{32}$  開 · 3  $\frac{3}{4}$  印張 · 2 插頁 · 89,000 字

1955 年 10 月 第 1 版

1957 年 1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數：8,501—27,500

## 目 錄

魯迅後期雜文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精神.....	1
魯迅是蘇聯人民和蘇聯文學最忠誠的朋友.....	15
讀‘彷徨’中的三篇小說.....	22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33
俞平伯的錯誤思想主要表現在哪裏.....	50
批判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思想.....	59
胡風是魯迅精神的歪曲者.....	73
<b>短論二則</b>	
文人必須有行.....	86
談同學們寫詩的問題.....	90
一篇不朽的史詩——‘列寧’.....	95
工業戰線上的英雄主義.....	103
紀念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現實主義作家——拉伯雷.....	111
後記.....	118

## 魯迅後期雜文中的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的精神

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這幾年中間，魯迅先生經歷了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一段極其深刻而徹底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時期。經過這次自我批判和改造以後，魯迅先生達到了他的生命中的更高、更光輝的境界：他在中國革命陣地上作為思想鬥士和文學作家的戰鬥實績，是較之前一個時期，更加卓越和偉大了。這首先是因為從這時候起，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已經不再是從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與觀點，以及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而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了；他對於中國人民大眾革命的力量和前途，已經沒有絲毫的懷疑，而是堅信‘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了；因此，從這時候起，他在探索什麼是推動中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的時候的那種苦悶、彷徨的情緒，已經不再留有絲毫的陰影，而且因為與中國革命大眾的緊密的結合，而具有無限堅強的信心與力量，更加堅決地把自己的文學作品當成是中國革命有力的宣傳鼓動的武器了。

這樣一個巨大的發展，無論是就魯迅先生本人，或是就中國新文學運動前進的歷史看來，都是非常地重要的。這個發展，一方面標誌了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先生前後期思想的本質上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標誌了作為文學家和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的魯迅先生在創作方法上前後期的顯著不同的面貌。從這時候起，貫串在魯迅先生作品裏的，就已經不是前期（‘五四’時期）的批判的現實主義（魯迅先

生前期的現實主義是比資產階級批判的現實主義更前進了一步的)，而是後期(‘左聯’時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了。

魯迅先生在他的後期(左聯時期)是以雜文這種獨特的文學形式為其主要的戰鬥武器的。在這個時期內，他的作品除了收在‘故事新編’中的五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說外，其餘幾乎全部都是雜文。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前所寫成的雜文後來收集成冊的，計有：‘二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集’、‘且介亭雜文二集’和‘且介亭雜文末編’等八個集子，另外還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拾遺’裏。

魯迅先生為什麼要在這個時期採用雜文這種文學形式來做他的主要的戰鬥武器，也就是說，魯迅為什麼幾乎全部放棄了他在前一個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發揮了巨大戰鬥作用的小說的寫作，而來專門地寫作這種短小精悍的政論性的雜文呢？這是有着他的主觀上和客觀上的理由和原因的。關於這一點，瞿秋白同志在‘魯迅雜感集’的序文裏曾經有過極其透闢的分析。他說：‘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鏘鏘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衆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秋白同志這一段話，十分扼要地根據魯迅先生當時的客觀環境

●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第二頁，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訂正再版。

和雜文這種藝術形式的特殊作用，說明了魯迅先生為什麼專門利用雜文這個文藝武器來進行堅苦鬥爭的真正原因。然而原因還有魯迅先生主觀的一方面；而這是與魯迅先生的一貫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方法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如所週知，魯迅先生開始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就不同於別的作家，他不是根據自己個人興趣和前途的需要而來從事寫作的；他有著非常明顯的利用文學藝術來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崇高的願望和目的。他說他之所以要開始創作小說，是‘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sup>①</sup> 這種對於創作的崇高的願望和目的，到了魯迅先生的後期，不徒沒有改變，而是顯得更加積極和明確了。這是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的一個方面。而另外，同其他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他又是嚴格地認為人民生活才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的。他主張‘革命文學家要寫工農羣衆，必須熟悉工農羣衆的生活，首先作家自己必須工農階級化，必須深入工農羣衆，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sup>②</sup>。‘但是，魯迅先生，在後期，和廣泛羣衆——尤其工農羣衆直接接近的自由是完全被剝奪了’<sup>③</sup>，所以魯迅先生‘認為在還不能寫工農羣衆的時候，就不要勉強寫’<sup>④</sup>。這又是魯迅先生的嚴肅認真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的另一個方面。

雖然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曾經殘酷地剝奪了魯迅先生接近廣大工農羣衆的可能，雖然他們想一手扼殺我們這位傑出的導師的創作生命，雖然魯迅先生因為失去了進行創作所必須的生活泉源，而不

①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一〇八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②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九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③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八六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④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九二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得不暫時地放下他的創作小說的如樣的大筆來；但是魯迅先生却還是非寫作不可，非戰鬥不可的，因為正在深入地發展着的中國革命的形勢需要他寫，他的‘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sup>●</sup>的革命的思想認識迫促他寫，而他的對於腐朽黑暗的舊中國社會制度的無比憤恨和他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暫時艱苦而到底一定要勝利的堅強信念，也在時時刻刻地要求和鼓舞他寫。於是魯迅先生，在左聯時期就不得不以雜文這種文藝形式來作為他的戰鬥的主要武器，同時，他在本時期所寫的雜文，也就不能不具有他在前期小說中的那種真實而具體地剖析和描繪中國社會生活、反映中國革命歷史特點的思想上的和藝術上的偉大特色。而且，更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後期雜文中，隨處洋溢着強烈分明的階級愛憎，以及他的不怕困難，無視危險的大無畏的精神，對於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們，是一種強大的鼓舞、教育的力量。而這些正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作品所具有的最本質的特色。

魯迅先生的後期的著作，特別是他的那些晶瑩而犀利的雜文，具有着高度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精神；他在經過了比較長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艱苦鬥爭之後所獲得的那種明確而堅強的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的信念和他的那種堅持思想鬥爭的堅毅的精神意志，是完全地鎔鑄到他後期的雜文中來了。

我們不會也不會忘記一九三〇——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左翼作家聯盟時期的這一個充滿了艱苦和鬥爭的年代。那是中國革命勢力遭受了挫折而仍在黨的領導下繼續深入地發展的年代；那是中國的

---

● 翟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雜感選集》第二〇頁，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訂正再版。

反動統治者——蔣介石匪幫以白色恐怖殘酷地鎮壓中國革命、大規模地屠殺廣大革命羣衆的年代；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中國的賣國政府，強佔了我們的東北，並想進而席捲全中國的年代；同時，這也是魯迅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和全國各大城市向反動統治者及其幫兇、幫閒的走狗們進行堅韌不屈的戰鬥的年代。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便很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和它的最本質的特徵，並以此教育、鼓舞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抗和革命的意志。

魯迅先生從‘五四’時期起，一直堅持着與‘吃人’的統治者的鬥爭，一直以他的雜文來揭露從有階級社會以來的‘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反映‘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和‘悲慘的弱者的呼號’，而且還要喚醒廣大青年們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這樣的工作，到了他的後期，是顯得更為堅實和有力了。他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sup>①</sup>他的後期雜文便切實地執行了這樣的戰鬥任務。他揭露了存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裏的尖銳的矛盾和鬥爭，刻畫了反動統治者的兇殘無恥的醜惡的嘴臉，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的生活和中國革命的必然要勝利的前途。他看到：‘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sup>②</sup>；他看到：‘在事實上……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槍砲’<sup>③</sup>，他說：‘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

①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三九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②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六七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③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七二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羣衆’<sup>一</sup>。但是他更看到：‘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sup>二</sup>。而且由此，他更堅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sup>三</sup>，‘……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sup>四</sup>。在這裏，魯迅先生不只指出了舊的腐朽的事物之兇殘的面貌與其必然的潰滅，同時，更加重要的是，他也顯示了新的革命的力量之逐漸地壯大，而且必然地會獲得勝利。這是他的後期雜文中最顯著的特色；而這樣的一個特色，正是由於他真實地、具體地描寫了左聯時期的最本質的歷史特徵而產生出來的。

在魯迅先生後期雜文裏，也刻畫了舊中國統治者另一種卑賤無恥的面貌：對日本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極端的醜態。這種醜態，正好與反動統治者對於中國勞苦大眾和愛國青年的猙獰面貌，成爲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在‘文章與題目’（‘爲自由書’）一文中，魯迅先生十分尖銳地撕開了‘攘外必先安內’論者的最實在的思想：‘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和‘外就是內，本無可攘’<sup>五</sup>。這三種無恥之尤的思想。在‘友邦驚詫論’（‘二心集’）一文中，魯迅先生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爲了媚外而屠殺徒手請願的青年學生的罪行，提出了極其強烈的抗議；同時也指出了國民黨的所謂‘友邦人士’，原是與日本帝國主義一夥的強盜。在‘出賣靈魂的秘訣’（‘爲自由書’）一文中，魯迅先生更揭露了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胡適之流的東

一 ‘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二 ‘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一九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三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一九八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四 ‘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五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五四三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西，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獻‘征心’策的出賣靈魂的醜態。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上，魯迅先生以他的鋒利的筆端，把侵略者及其走狗們的窮兇極惡、卑賤無恥的面貌揭露在中國人民大眾的面前，激發了他們對於敵人的強烈的仇恨；同時，魯迅先生也以他的深厚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教育了中國人民大眾，使他們知道怎樣在自己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徹底的自由與解放而鬥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於魯迅先生曾經有過極其崇高的評價。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sup>一</sup>毛主席的這種精確的推崇和估價，我們是在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中得到完全真實的證明了。

魯迅先生在後期，又以他的雜文表現了中國人民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的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誼，滿懷熱情地指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對於喝血的帝國主義，是一個致命的威脅，而對於爭取自由和解放的中國勞動人民，則是走向戰鬥和勝利的強大的鼓舞力量。他說：蘇聯革命的成功，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又說：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要進攻蘇聯的原因，是因為‘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sup>二</sup>。然而，‘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雍疽，是他們的寶貝，那末，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

●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六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二七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了。……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sup>❶</sup> 魯迅是一個卓越的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是緊密而不可分割的。他憎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因此，他不能不憎恨和呵斥那作為他們的主子的帝國主義；他熱愛中國人民，因此，他不能不熱愛和讚揚那同情與支持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蘇聯。而魯迅先生，也就以他的辛勤的工作來證明和支持了自己的主張。他翻譯、介紹了許多蘇聯的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的書籍，一方面以新的精神、道德，教導了中國的廣大讀者，並且也使年輕的中國革命文學在蘇聯文學的灌溉與扶助之下，日益滋長和壯大起來。他說：‘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却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sup>❷</sup> 魯迅先生不僅為我們說明了過去‘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發展的歷史，而且也預示了將來‘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日益輝煌的前途。就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也有着非常堅強樂觀的信心。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的歷史，從來就是跟各種反動的唯

❶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三一一三二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❷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五七—五八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心的文藝思想作鬥爭的歷史；可以這樣說，中國的革命文學，就是在這種不停的鬥爭之中成長和壯大起來的。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在掃清革命文學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這一重要工作上，擔負了主要的戰鬥任務。他與替帝國主義作‘寵犬’的‘民族主義文學’作鬥爭，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梁實秋之類的人物作鬥爭，與那些自稱為‘死抱住文學不放手’的‘第三種人’作鬥爭。（同時，他也與自己陣營裏的不正確的傾向和思想作鬥爭。）他以他的利刃般的筆鋒，剝露了各色各樣的敵人的‘吧兒狗’似的臉孔，粉碎了他們的那些烏烟瘴氣的‘理論’，因而，他使我們的革命文學在反動派的高壓與迫害之下，大踏步地向前進軍。日丹諾夫在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中，曾說：‘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即伯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羅留勃夫底偉大傳統底繼承者，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和具有社會傾向的藝術的守護者。普列哈諾夫寫作了許多東西來揭露那種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唯心論的和反科學的觀念並保衛我們俄國偉大革命民主派底基本原理，這些偉大革命民主派曾教導我們把文學當作為人民服務的強有力的手段。’● 魯迅先生在他的後期，同樣也是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和他的早期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批評，捍衛了我國正在困難中前進的現實主義的和有社會傾向的革命文學藝術。他的雜文中的這一部分的作品，到現在依然照耀着我國文學藝術向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繼續前進的道路。

我們把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作了這樣一個粗略的、概括的敘述，主要的目的只想說明一個問題：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是真實地、具體地在革命的發展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歷史特徵，而且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精神教育和鼓舞了中國廣大人民的，而這正是社

● ‘蘇聯文學藝術問題’第五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最基本的特色。魯迅先生在後期所達到的思想上的和藝術上的高度，正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左翼作家聯盟時期所可能達到的高度。

魯迅先生在左聯時期的雜文之所以可能達到如此的高度，他的文學事業的道路之所以可能從批判的現實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認為至少有下面三個原因，而這也就接觸到我們今天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什麼的問題上來了。

第一，我認為這是與魯迅先生的認真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的黨性原則來從事文學活動的革命精神分不開的。我們知道，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是在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影響之下產生起來的，因此，在‘五四’時期產生出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和它的主要的領導人——魯迅先生，就不可能不接受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在魯迅先生當時，是非常間接的、不顯著的。魯迅先生在‘五四’時期，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看法，基本上還是一個達爾文的‘進化論’的信奉者。所以在‘五四’時期的魯迅先生的著作中，雖然主要地表現了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戰鬥的精神和意志，但總不免呈露出一些消極和悲觀的氣氛。這種消極和悲觀的氣氛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不外兩個：他沒有看清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方向，同時也沒有發現廣大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的‘轉移乾坤’的偉大力量。因為這樣，他在前期的作品，雖然也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和腐朽，但不能明確地指給讀者以一條前進的道路，不能強有力地鼓舞起人們向前邁進的信心。所以，魯迅先生前期的作品，就不能不是屬於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範疇的。

但是，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繼續不斷的發展，由於國民黨背叛革命後對於中國工農羣衆和革命青年的大舉屠殺，更由於中國共產黨

領導全國人民的百折不撓的鬥爭，魯迅先生對中國政治的現況和前途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就在這種形勢之下，魯迅先生開始認真地從事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和蘇聯文藝理論書籍的翻譯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先生開始掌握了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開始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獲得了絕大的鼓舞和支持的力量，而同時，也就開始以自己的文學創作——特別是雜文——當成是黨和人民的總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在中國革命前進的道上發揮了無比偉大的作用。馮雪峯同志說：‘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非常密切的關係，最主要的可以說都很明顯地反映在他晚年的全部著作上面了。他晚年的著作最深刻和充分地反映着那十年的人民革命鬥爭，其中也就明顯地反映着我們黨的領導所給他的思想上的影響。’●

這種思想上的影響，我以為主要地表現在魯迅先生始終堅持了列寧所提出的文學的黨性原則這一重要事實上。在魯迅先生的後期雜文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麼一點，就是：與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利的，他竭力地擁護；與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害的，他竭力地反對。他一方面‘橫眉冷對千夫指’；另一方面又‘俯首甘為孺子牛’。他一方面無情地揭露和打擊了在社會中遇到的種種無恥、愚昧和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寫出了那些為人民和革命的利益而英勇犧牲的英雄人物的光輝燦爛的形象。他永遠地以他的作品服務於人民而不計其他。

這就是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之所以能够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是我們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的第一點。

第二，這又是與魯迅先生的嚴格地要求自己，長期而艱苦地進

---

● 馮雪峯：‘論文集’（第一卷）第二四三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行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精神分不開的。毛主席這樣地教導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而這個改造的關鍵，就在於要我們‘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魯迅先生在左聯時期，是完全被剝奪了和廣大工農羣衆直接接近的可能的，然而，魯迅先生的為人民服務的堅強的意志，又使他不能放下文藝的武器來。於是，魯迅先生就不得不在和廣大工農羣衆隔絕的環境之下，來進行他的自我改造的工作，來批判他的早期的建立在個人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而這項工作，也就不得不成為更其艱鉅的了。在這裏，我們正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驚人的思想毅力來。

馮雪峯同志在‘回憶魯迅’一書中，曾經這樣地提到魯迅先生在後期開始時的自我思想鬥爭的情況，他說：‘他當然不是屬於“純從自身的利害着想而跑過去”的那一類型的，然而他也必須要“跑過去”；這樣，在他就必須先對於革命和將來有明確的認識，必須深知“真理之所在”，必須肅清自己的“懷疑”和某些“悲觀”，也自然就要否定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雖然在他那裏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並且要根本地否定作為這階級立場的基礎的個人主義思想與感情。我認為這是魯迅先生那時候的自我思想鬥爭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問題。由於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幫助，這個自我思想鬥爭的結果，魯迅先生不滿足於自己僅做一個小資產階級急進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家，而是堅定地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成為一個共產主

●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七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義者，一個共產黨人的親密的同志（雖然沒有組織關係），這是他的勝利和他的偉大的所在。」●在同一書中，雪峯同志還敘述過當魯迅先生克服了他前期思想中的某些‘積習’或‘病症’（失望的情緒和懷疑的思想）的時候，他是感到如何的輕快與喜悅，而他的基於無產階級立場的戰鬥的意志，又是如何特別地高揚。正因為魯迅先生能够毫無保留地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化戰線前哨上的一個戰士，所以他才能够寫下來那麼多的光芒萬丈的雜文，以革命的進取的無畏精神教育人民，同時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永垂不朽的作品。

這是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之所以能够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的第二個重要原因，而這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切實地向魯迅先生學習的地方。

第三，我們還必須指出：魯迅先生極善於繼承和發揚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而他後期的富有戰鬥精神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雜文，便是從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和他前期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一九五一年六月號‘布爾什維克雜誌’的社論——‘蘇聯文學在新的高漲中’一文，曾經這樣明確地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俄國古典文學作家之間的正確關係：‘蘇聯文化的產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吸收並且批判地改造過去文化基礎上的。蘇聯作家記住而且深深地重視俄國古典文學作家、首先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遺言……蘇聯作家是以他們是俄國文學巨匠的學生和繼承者而自豪的。’●沒有疑問，我國‘五四’運動時期的以現實主義為其主流的新文學，正是在繼承了我國古典現實主

●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二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 嫩伯華等譯：‘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個問題’第五六—五七頁，文藝翻譯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